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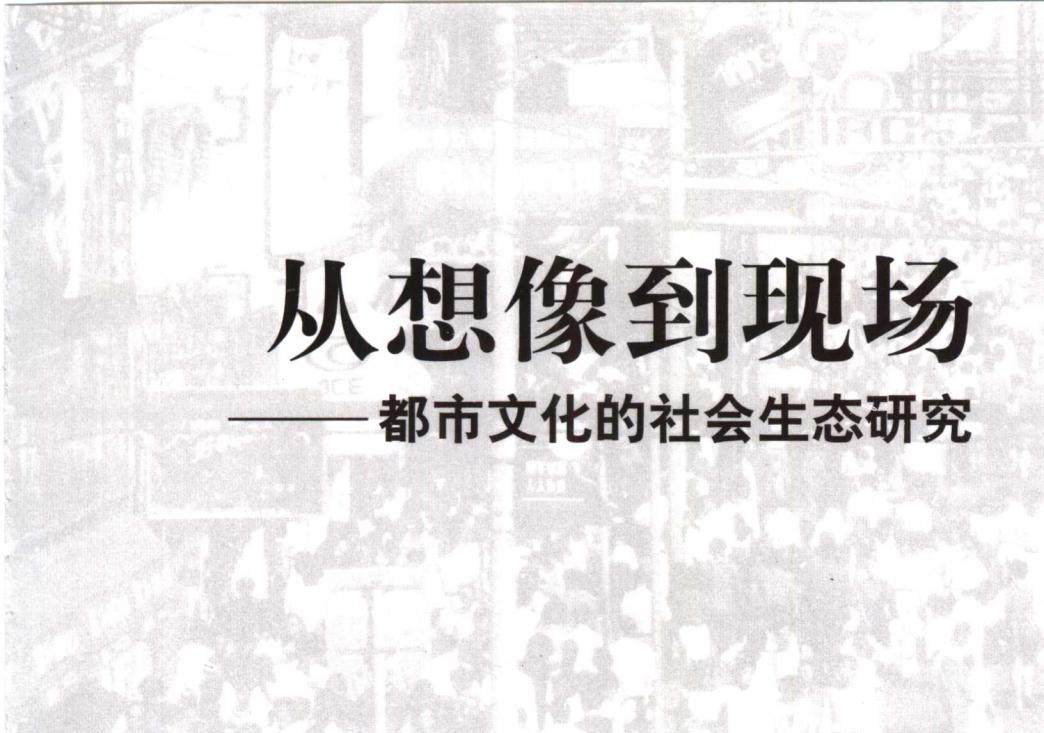
从想像到现场

——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

叶中强 著

CONG XIANGXIANG
DAO XIANCHANG
DUSHI WENHUA DE
SHEHUI SHENGTAI YANJIU

学林出版社



从想像到现场

——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

叶中强 著

CONG XIANGXIANG
DAO XIANCHANG
DUSHI WENHUA DE
SHEHUI SHENGTAI YANJIU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想像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叶中强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3
ISBN 7-80668-906-0

I. 从... II. 叶... III. 城市-文化-研究-上海市 IV. G1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074 号

从想像到现场 ——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



作 者	——叶中强
特 约 编辑	——陈晶龙
封 面 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1/32
印 张	—— 9.25
字 数	—— 19.7 万
版 次	——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3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668-906-0/G · 311
定 价	—— 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人文想像与城市学考古	1
一、都市：当代文学中的一种困惑	3
(一) 作为价值坐标的都市与乡村	3
(二) 作为想像中的都市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	7
(三) 作为文化记忆的都市	12
二、另一种解读方式：都市及其文化的元话语追踪	16
(一) 城市：西方走出中世纪的一个缺口	17
(二) 中国城市语境：市场生存与人文心理震荡	19
三、城市学考古：从西美尔到沃思	27
(一) 西方古典城市社会学的崛起	28
(二) 城市精神生活的社会学元因素分析	29
(三) 一种纯粹的“城市性”是可能的吗	36
(四) “片面的真理”：西美尔、沃思与中国人文心态	39
第二章 现场还原与文化定位	43
四、空间的生产：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环境的形成	45
(一) 从四马路出发：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生成	45
(二) 张园：一个“公共领域”性质的休闲娱乐场所	48

(三) 赛马与影戏：西方娱乐方式及其娱乐精神的输入	51
(四) 现代物性体验：文化消费的空间策略	55
五、城市、时间与人：市民文化消费空间形成的原因	59
(一) 城市：贸易中心的崛起与文化空间的形成	59
(二) 时间：劳动与闲暇的分离及休闲时间的延长	62
(三) 人：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文化选择	64
六、“士”的转型：稿酬制度的建立与近代文人的生成	67
(一) 近代稿酬制度的滥觞	67
(二) 小说市场对剩余“知识劳力”的吸纳	70
(三) “经济人”意识与文人人格转型	75
七、个案研究：王韬与包天笑的城市生活及其经济来源	80
(一) 王韬在上海的生活及其经济来源	80
(二) 包天笑在上海的生活及其经济来源	87
八、重建社群感：清末民初上海文人的结社	99
(一) 遗老文社与“遗老文学”	101
(二) 新型文人社团：南社的成员构成、组织体制及其精神气质	104
九、文人交往与城市公共空间	110
(一) 文人交往与私家园林开放	110
(二) 从愚园到半淞园	115
(三) 张园：文人世俗化的载体	118

目 录 3

(四) 个案研究:张园、《游戏报》与《官场现形记》	121
十、城市社会的“恶之花”:花街柳巷与近代文学生产	126
(一) 文人的冶游生涯	127
(二) 开花榜:小报的市场策略与文人名声	135
(三) 文人冶游与文学生产之关系	138
十一、从边缘到中心:“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思考	144
(一) 关于“典型上海作家”及其居所的考辨	144
(二) 谁住在亭子间: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化迁徙	151
(三) [附录]跻身亭子间的非亭子间作家:郁达夫在上海的一张生活日程表	161
第三章 空间重构与制度创新	173
十二、空间的再生产: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环境的重构	175
(一) 市民文化空间的三种功能指向	175
(二) 个案研究一:上海的酒吧或咖啡馆	178
(三) 个案研究二:上海的舞厅	192
(四) 一次从舞厅话题开始的访谈	205
十三、“体验经济”与市民文化空间	207
(一) 体验经济与城市复兴	208
(二) 体验经济与文化生产	214
(三) 消费空间与体验平台	219
十四、全球化语境中的都市文化生产	229

4 从想像到现场

(一) 融入全球化的都市经济与文化	230
(二) 全球化语境中的一种文化生态	233
(三) 抢滩上海:一个跨国资本进入的个案	242
十五、创新能力培育:建立一个良性的都市文化	
生态环境	247
(一) 上海文化创新能力的基本状况分析	248
(二) 全球化语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创新	258
(三) 对策与制度设计	264

表格目录

表一:1865 年工部局统计职业人数表	64
表二:1875 年前公共租界外国人职业概况表	65
表三:1865 年上海公共租界华人职业分布表	65
表四:南社雅集的地点	114
表五:郁达夫在上海的一段生活日程	162
主要参考文献	279
后记	286

第一章

人文想像与城市学考古

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缺乏深厚的都市文化底蕴。在以往众多的文化思考中，我们总能在积淀了几千年的乡村阅读中，玩味出诸多“深刻”的道理，然而短短的一段中国近代都市历史，则是被政治话语或民族话语“格式化”了的文本。今天，当都市以其应有的经济、社会、文化涵义突然崛起在我们眼前，我们似乎无法从现存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抑或从对传统的原始记忆中获得一种足够的心理支撑力量，来直面当今的都市化转型。都市是什么？人文意义上的“都市”是如何被构建起来，并成为我们的一种知识传统的？让我们先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种“都市”和西方语境中的“都市”谈起。



一、都市：当代文学中的一种困惑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都市化”不仅被认作一种现代化的物质定向，亦曾被预想为一种催生新人文形态的媒介。然而这种认同却又常常为都市化现实推进所引发的种种价值矛盾所消解，其文学显形，即是在一些文本中，作家奔向都市的努力往往会悄然转化为一种反都市倾向。产生这种价值震荡的主要原因，恐怕与我们的文化经验有关，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少有关于都市的经验，中国最早的近代都市上海，迄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根本无法与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乡村经验相比。因此，都市无论是作为一种实体空间抑或人文形态，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让我们先从当前文学文本中的一种“都市”谈起。

(一) 作为价值坐标的都市与乡村

在西方理论界，“都市”作为一个相对于乡村的理论话语，曾随着19世纪中叶欧洲城市的发展而膨胀，但又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及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的商品、设施、人员、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跨地区的渗透，其语义内涵的特殊性相对减轻。尽管都市的意象在其后现代语境中重又反弹，但作为乡村与都市截然两分的传统文化对比则随着现实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而渐趋淡化。然而在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当下语境中，都市则越来越成为一个聚焦点。都市化不仅被看作一种现代化的物质定向（“恢复上海昔时大都市的辉

煌”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规避了其政治、民族内容的器物层面的提法),亦曾被预想为一种催生“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心理结构,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文系统”等新精神文化机制的媒介。故而在在中国当下语境中,乡村与都市的截然两分,不仅一度被演绎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落后与发展的同义语,亦在文化思考和文学创作中成为一种显在或隐性的价值坐标或思维框架。20世纪80年代许多充满现代激情的寻根文学,其对中国文化滞后根源的追寻,大多落实到荒蛮封闭的乡村地带,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文学显形(当然不包括张承志那种意在寻回未被文明发展污染的原始生命状态的逆向寻根旨归)。

但随着现代化方案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和市场的迅猛推进,日新月异的器物层面对较为深层的体制、观念产生剧烈震荡的时候,人们发觉,作为物质定向的都市依然存在,但作为新精神文化催生媒介的都市则受到了某种质疑。人们在坚持把都市化作为现代化的感性说明语时,亦普遍地感到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转型期的种种价值矛盾。其中包括:生态学意义上的人与环境之间,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权力与资本市场之间,人文学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冲突。其间,乡村与都市两分的思维框架依在,但价值坐标系上的正反两极却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乡村的方式被阐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人性的自然形式及价值观念的凝聚和确定;都市的方式则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对峙,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性的异化及价值观念的分裂与离散。

这种价值尺度的变换,在人文学科及文学创作中最显著

的反映,莫过于终极关怀与世俗化倾向的两极分野。且不论张承志在小说《心灵史》及其散文中,如何站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对都市文明表现了金刚怒目式的厌恶和排拒;张炜在其小说《柏慧》中,如何刻意营造了乡村与都市两种截然相反、互为善恶的心灵场所;亦不论王朔如何游走于京城的通衢里巷,以一种张扬到极点的世俗精神,对各类中心话语施行着“痞子”式的解构,我们只要把一位较偏重于理性思考,并亲历了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女作家王安忆的两篇小说《姊妹们》和《我爱比尔》作一比较,即可见出一种更为隐在的也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尺度变换。

《姊妹们》中“我们庄”的姊妹们单纯、质朴、透明,富于同情心,小有心计却不失善良的本性在一种井然有序的农业文明中凸现无匿。而《我爱比尔》则是一个关于“性殖民”的故事,是后殖民话语中“经济殖民”和“文化殖民”之外的又一类“后现象”。女主人公阿三才貌双俱,品味高雅,与西洋男士交,既非图钱财又非纯为性,其游走于西方男性之间,纯粹出于一种对他们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崇拜。小说的隐喻意味十分明显,即西方世界代表着强悍的男性,第三世界代表着弱势的女性,从而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被形之于一种具有强弱之分的性别关系。然而故事发生在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大都市上海,则不免又为都市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否只有开放型的大都市才会为代表着强势文明的西方男性,递上一道阿三那样“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充满东方韵味的性别点心?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小鲍庄》、《大刘庄》及“我们庄”的姊妹们生活虽清贫,环境虽封闭,但性殖民的话语却离她们像大都市那样遥远;都市虽开

放、活跃,焕发勃勃生机,却处处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和陷阱。都市之于乡村,似乎印证了作家一贯认定的命题,即任何文明的发展终要以相应的自然、社会代价为前提。其实从《小鲍庄》、《大刘庄》到“我们庄”的跨越,已蕴含了作家一种不易被察觉的价值转换,如果说前两者的乡村社会,是 80 年代的作家用以剖析中国文化落后根性的对象,那么后者的乡村社会,则是 90 年代的作家用以反衬都市欲望游戏并汲取批判性思想资料的场所。

与这种价值尺度变换相对应的是,深圳的《特区文学》和上海的《上海文学》相继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推出了“新都市文学”和“新市民文学”的旗号。旗号的举起,固然与其各自特殊的城市背景有关,但更为显在的原因则是两者所据的历史主义理性立场,即认定乡村与都市代表着两种文明的范式,承认现代化是一种广泛的城市化或都市化过程,而现代人格精神的建设则有赖于一种都市意识的获得:“当代的都市意识自然不是对都市的沉迷,更不是对都市的拒绝,它必须从人类历史进程无法阻挡的角度首先投入对都市和工业化社会的都市化进程的热爱而非厌恶,对都市生活方式(如繁忙、喧嚣、复杂、流动等)的理解而非抗拒,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显示作家应有的价值选择。……而恪守传统的农业社会和非都市社会的价值立场去评价当代的都市生活,则不是隔靴搔痒,就是盲人摸象”^①。然而,这种既非“对都市的沉迷”更非“对都市的拒绝”的“当代都市意识”究竟又是什么呢?显然理论的提

^① 杨苗燕:《摇动的风景——都市文学与都市意识随想》,载《特区文学》1996 年第 2 期。

出者除了表明一种积极的历史主义理性态度外，并未正面回答。此外，“不是对都市的沉迷”和“更不是对都市的拒绝”这类话语本身潜伏着一种自我颠覆的危险，即认定都市包含着某种事先约定的“罪恶”，沉迷其中则与都市意识无涉，拒之千里则又与历史发展相违。故在其深度心理模式中仍与一种“乡村美，都市恶”的原始记忆相通。再考察一下旗号下的创作实践及一些非旗号推动下的都市文本，则又很快发觉，这种奔向都市的努力仍然是复杂和尴尬的。清醒的历史主义理性同作家的经验世界和文化记忆存在着很大的距离，都市文学或市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仅表现为写都市或写市民的文学，作为现代性诉求的都市价值坐标或都市生活的“内在美”，则依然是架构于理论想像中的一片绿洲，有时情况恰恰相反，写都市的激情又悄然转化为对都市的拒斥。

都市人的精神家园在哪里？这成了中国都市化进程中一个典型的现代性发问。

(二) 作为想像中的都市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都市是什么？各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在政治家眼中，都市是政治中心，是一套完备的机构、组织和体制；在经济学家眼中，都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是交换空间和分工、效率、商品、货币等各类经济要素的综合显形；在文化人眼中，都市是大学、书店、剧场、影院、出版社和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集群处；在社会学家眼中，都市首先是一种人类聚居的大型社区。但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都市概念，则是一种感性化的世俗物质空间：是林立的高楼、绵延的立交、

琳琅满目的商品、五光十色的街景；是银行、证交所、咖啡屋、酒吧、名牌服装、新式汽车、足球赛、人头马 XO 及各类用现代名义的帐幔披挂起来的欲望。当然，除了这类经典意义上的以满足人的食、色、用需求的物质空间外，都市尚有一种能制造“空间”的物质空间——发达的电子媒体和各类声光技术使人们摆脱了自然物理空间的限制，虚拟了人们的此时此在，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几乎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事件，乃至当代科技所及的外层空间。

这类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物质空间，正是当下作家用以营构其特定的文本“格式”——“都市性”的建材，如《丽人公寓》中的五星级宾馆、《水魔》中的花园别墅、《股潮》中的证交所、《戈兰小姐的否定之否定》中的卡拉OK舞厅、《驶出欲望街》中的“欲望街”、《公司衍生物》中的旋转餐厅和“信息高速公路”等，都有其特定的语义内涵。如果一旦离开了这类被选定的物质材料，则无以构成文本的“都市性”，故而“都市”首先是以这种特殊的“物”的形式被想像、结构出来。

文本中的都市物质空间，是都市人赖以活动的场所，是标示其现代性特征的身份证。在唐颖的《丽人公寓》中，宝宝与海兰潇洒地穿越都市的五光十色，然后坐进烛光摇曳的“莉莉吧”，吃一份“德国情人”比萨饼，放一大杯扎啤在边上，感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豪气；在潘向黎的《无梦相随》中，奚宁悠闲地踱入名品商店，精心地挑选一组冬天用的口红和圣·罗朗皮具，其精致独到的心理呈示，使人联想到那种只有都市才会有“购物人生”及仅属于都市人的那种超凡脱俗的物性体验。而在裘山山的《戈兰小姐的否定之否定》中，物不仅是场所和身份证，亦结构了都市人本身。小说中曾出现两个截然不同

的戈兰形象：一个是洗却铅华，神态慵懒，退居私人日常生活的戈兰；一个是用旗袍式黑衣裙和恰到好处的化妆包装起来，并被卡拉OK混响器和轻曼的舞姿强化了的戈兰。当其被介绍给孙先生时，孙先生对第一个戈兰毫无兴趣，对第二个戈兰则心醉神迷，并不由发出这样的慨叹：“看来，对人的了解是要有个过程的。”了解的意义在于获得真实，而在孙先生的眼中，那个离开了物的资助的戈兰决不是真实的戈兰，物构成了戈兰的一部分。都市的物质空间不仅塑造了“随物赋形”的都市人生，亦如一座森然的围城，实施了自身与乡村的分野。在刘庆邦的《家园何处》中，来自乡野阡陌的打工妹站在都市的十字街口，在飞速跳跃的霓虹灯和层叠相挤的巨幅广告刺激下，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生怕走远而迷了路”。这种乡村对于都市的恐惧，使我们联想起《子夜》中吴老太爷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入城式”，同样的城市物质空间，曾使这位乡村土绅震惊而亡。都市的物质空间一方面以其冰冷傲慢的“都市性”拒斥了乡村，另一方面又以“都市生存权”为诱饵，赎买了乡村的纯净与贞操。在莫言的《你的行为使我恐惧》中，清纯的乡村歌手被都市驯化、电声化、色欲化，充满乡村原汁原味、原情原欲和原始生命力度的歌声，连同来自乡村的艺术、灵魂一起被风干物化。在《家园何处》中，都市则以其廉价的物的形式，诱取了打工妹的贞操，并以同样廉价的“物”迫使其实现为释放城市欲望的“下水道”——妓女。

都市的物质空间如此强大，以致挤压了都市本身。在这里，嘈杂的市声撕破了乡村的宁静（刘继明《蓝庙》）；金钱的度量衡抚平了“长相思、莫相忘”、“执手相看，唯有泪千行”的乡村古典脉脉温情（张欣《爱又如何》）；冰冷的交换原

则和工具理性消解了乡村的急公好义和古道热肠(钟道新《公司衍生物》)。方方在《状态》中这样提及都市：“陈东东刚从深圳回来，整耳朵装的都是股票、大款、桑拿浴、赛马以及别墅以及 KTV 包房以及妓一类的字眼”；在唐颖的《丽人公寓》中，宝宝这样对海兰说：“有过这么多物质和金钱的参予，何来柏拉图？柏拉图不适应你我。周围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可以消费，柏拉图活到现在，也一定是个物质主义者”，故而“理想人生的每一刻都该是丝丝缕缕，点点滴滴充满丰富的物的质性”。由是，物不仅构成了都市的形式，亦演化为都市的内容——一个物化的世界和物化的人生。于是在都市对乡村的一系列强硬对话中，一种近乎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被建立起来：都市——物和欲的象征，是“人性丑陋”的供养地；乡村——情与真的故乡，是圣洁灵魂的寄附处。生活在物的夹缝中的都市人，是很难觅得一丝精神绿地抑或价值深度的，于是“出走”和“逃离”便成了时下都市文本中一道奇特的风景。

在张欣的《爱又如何》中，可馨的离家出走，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传统的“现代人”一旦离开故我的精神家园，融入一个日益物化的都市时所处的尴尬地位，传统的义利观念在物欲世界的紧逼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奈。旧的精神家园不足倚，新的精神栖息地无可寻，于是出走便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现代”都市人一种无家可归的心理现实。《丽人公寓》中的五星级宾馆本身即是都市的象征，那是一个聚财敛物、以钱识人的富人收容所，一个“好人不会去的地方”，一群年轻的宾馆女职员在此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斗争，但斗争的结果则无一例外地被逐或逃离。然而红尘滚滚，家园何处？作者想像了一座借以